

# 南匈奴“胜兵”性质新解

□张 莉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元二年（90年），“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其中“胜兵”的性质，林干先生认为“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并提出南匈奴“常备兵”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农业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三是受汉朝兵制的影响”<sup>①</sup>。在此以前，马长寿先生也曾有类似的想法<sup>②</sup>。

说“胜兵”是脱离生产的常备兵，这和笔者所见的一些基本史料是不相一致的。

“胜兵”一词，《史记》中似未见。《史记·大宛列传》用“控弦者”说明诸国的兵数。在《汉书》中“胜兵”才有明白的记载。《汉书·西域传》每论一国事，必举其户数、口数与胜兵数。如渠勒国“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胜兵三百人”，鄯善国“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大宛国“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这些是土著“城国”的情况，游牧的“行国”也是这种记述法。如乌孙“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焉耆“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汉时，游牧行国的战士都是“土力能挽弓，皆为甲骑”的，这在学界无异说。前后汉时，西北方国家变化很大，但同一个国家胜兵的情况，两汉书的记述基本一致。

《史记》与《汉书》记述匈奴战士没有用“胜兵”为说的，都是用“控弦之士”或“精兵”。用“胜兵”来说匈奴，最早是章和元年（87年）。当时北匈奴遭鲜卑等攻杀，惨败，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sup>③</sup>，诸阙内降。这里的北匈奴“胜兵”，与

原来的“控弦之士”及乌孙等国的“胜兵”，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北匈奴和前汉时的匈奴人一样，部落为居，游牧生活，其社会结构也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革。南北匈奴都有胜兵，且为同书同传所说，不会一个是牧民、战士合而为一的氏族军，一个是专事打仗的常备兵。

当然，说清楚南匈奴“胜兵”的性质，根本还在于弄清楚南匈奴的社会生活状况，胜兵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当时汉政府的关系。

南匈奴入居的八郡地区，汉时都是上好的游牧区。初居于此的游牧人，显然只能以游牧畜群为业。当时南匈奴的社会生活状况也说明这一点。《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单于安国闻汉军至，“弃帐而去”，又率部进攻左贤王师子，师子“悉将庐落入曼柏城”，说明他们还是过着“庐落”、“庐帐”的游牧生活。东汉政府打击叛乱的匈奴部落，所俘获的财物都是牛、马、羊等，也是他们以肉为食的具体表现。这些都是公元90年以后的情况，以前更是这样自不待言。

林干先生说南匈奴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举的例子是《晋书·北狄传》的一段记载：时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我们先不说这材料与他的结论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单就对材料的理解就有问题。且看完整的原文：“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呼韩邪感汉恩，来朝

① 林干：《匈奴史》，第122页。

②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82—83页。

③ 《后汉书·南匈奴传》（以下凡引此传不另注）。

……”显然,林先生所说的五千余落是呼韩邪时候的事,那是西汉宣、元、成帝时,不是东汉南匈奴的情况。

再说即便抛开时间关系,单就材料本身而言,也只是说到匈奴一部分人与汉人杂处,据此便说南匈奴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占了较大的比重,显然是材料本身所不具有的,而只是论者的过分引申。

南部匈奴本来只有四、五万人,其人口在公元90年前后突然增加,主要是北部匈奴人不断投降与其抄掠来的。正因为如此,范晔在写到此时匈奴人口兵数时,在前面特意加了句:“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的话。南匈奴人口既然大半来自抄掠与北部的降众,又且集中于公元90年前夕,那么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就有了根本的变化。

南匈奴的农业生活大概是在公元140年前后开始的。《后汉书》记左部句龙王等围攻美稷,一部分匈奴人随郡县迁到汾水流域的农业区,这为他们从事于农业生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而南匈奴社会经济生活有较大变化的事实,间接地反映于公元187年张纯反叛,灵帝诏南匈奴收兵配合幽州牧,讨伐张纯,匈奴人众怕单于“发兵无已”,于第二年攻杀单于。这个时候南匈奴部众不再象从前一样以战争为业为荣,恐怕战乱,该是住在农业生活区以后,已有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因素。说公元90年南匈奴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有也不是根本性的,至少文献资料没有这方面的记述。

另外,从户口、人数与胜兵数的比例也可看出,公元90年前后的南匈奴兵士与西汉时的情况差别并不大。南匈奴户为三万四千,胜兵为五万一百七十,平均每户要出一个半男子当兵,以人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计,平均4.6个人中就有一个充兵。西汉时的匈奴,贾谊在《新书·匈奴》篇曾说是“五口而出介卒一人”。这个比例比南匈奴的还要大些。五口一卒且是“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不到五人而出一兵当然更该如此。如果再考虑南匈奴人口增多的原因主

要是抄掠与投降来的,老弱妇幼为主,那么,这二十三万七千三百人中,能挽弓的当然都已是“胜兵”了,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甲骑。南匈奴平均每户约7人,这个比例大于西汉时的情况,也多于一般游牧部落户口的平均数,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抄掠人口甚多有关。游牧部落,凡抢掠来的人众都为奴婢,战士大多杀死,妇幼则掠为奴。由上面的分析,这五万多的胜兵之外,南匈奴中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壮丁从事牧业生产了,如此则与原来尽为甲骑没有什么区别,南匈奴的胜兵依然是平时游牧生产,战时上马打仗。

退一步说,若胜兵是常备兵,那么战士之外的部众,包括老弱残妇幼,平均三个多人就要养活一个不事生产的战士,这从当时匈奴的情况看是不可能的。匈奴新降众多是战争失败才投奔过来的,不仅劳力匮乏,也没有多少财物,其大部分畜群当然为战胜的敌人掠了去。另外一部分降者则是因为天气寒冷畜产冻死甚多,“饥蝗,降者前后而至”的。当时南部匈奴也是“苦蝗大饥”,需要汉政府供给粮食蓄产才能活命。这样的生产状况与经济条件,那里有剩余的食物供给五万多光吃饭不劳作的常备兵呢?

再从东汉政府的立场看,也不会容许南匈奴有五万多人的常备兵存在。东汉初,匈奴寇掠成为汉政府最大的祸患。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遂利用他们来保护边塞,作为防御北部各游牧人侵掠的屏障。为了防止南匈奴可能出现的越轨行为,东汉政府曾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东汉政府怎么会让他有五万多随时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常备兵存在呢?且常备兵即不同于氏族兵,职业性的,必然要有一整套编制、机构,有统一的指挥、经营与管理等,然专为封建统治者提供这方面材料的史家对此没有任何记录,甚至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这决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南匈奴的胜兵仍以各部落为单位,由部帅统辖。

(作者单位:宿州市委党校教研室)〔责任编辑:陈瑞〕